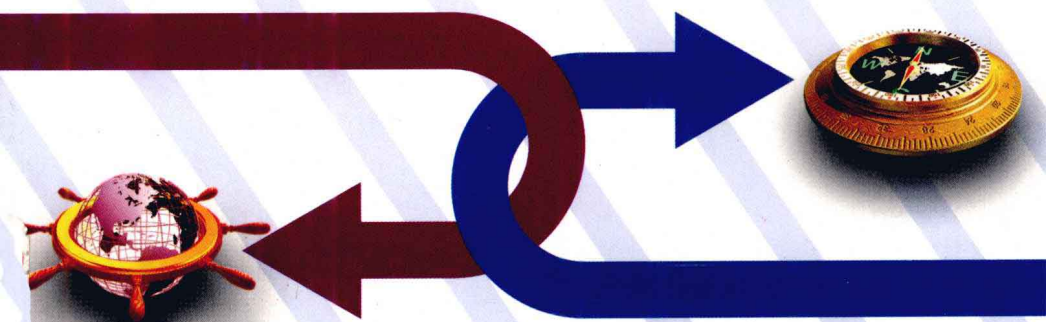


东亚国际关系史论

安成日 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亚国际关系史论/安成日编著.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5.3

(吉林文史出版社学术研究文库)

ISBN 7—80702—137—3

I. 东... II. 安... III. 国际关系史—东亚—文集
IV. D831.0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75192 号

Dongya Guoji Guanxi Shilun

东亚国际关系史论

安成日著

责任编辑:赵世德

封面设计:李岩冰 陈淡宁

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发行 850 毫米×1168 毫米 32 开本 11 印张 265 千字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2005 年 3 月第 1 版 200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长春市第九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印数:1—1 000 册 定价:18.00 元

ISBN 7—80702—137—3/G·190

序 言

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世界各国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的不加强,不仅在时间和空间上拉近了世界各国之间的距离,而且也在文化和心理上不断拉近了相互之间的距离。全球化正在迅猛推进,它已成为这个时代的标识。我们生活着的地球正在从时间和空间上不断被压缩,感觉变得越来越小,世界已被称之为“地球村”。在这个全球化时代,各国、各民族之间的沟通和相互理解显得比以往任何时期都重要。

如果说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那么中国与朝鲜半岛又是唇齿相依的关系。中、日、韩三国之间的交往源远流长,且日益密切。在我国研究日本、研究朝鲜半岛问题的著作和论文,也可谓汗牛充栋,但是如果问中国的日本研究、朝鲜半岛问题研究是否已经达到了极致,那也不见得。且不说随着时代的发展,新问题不断涌现,就连那些所谓的老问题、旧问题的研究也远未达到理想的境界。反观国外的中国问题的研究,无论从研究的深度上还是从研究广度上看,都远远超出了我们对对方的研究。

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国民党中的日本通戴季陶先生在其所著《日本论》中就谈道:“你们试跑到日本书坊店里去看,日本所做关于中国的书籍有多少? 哲学、文学、艺术、政治、经济、社会、地理、历史,各种方面,分门别类,有几千种。每个月在杂志上登载讲‘中国问题’的文章几百篇。参谋部、陆军省、海军军令部、海军省、农商务省、外务省、各团体、各公司,派来中国常住调查或是旅行观察的人员,每年有几千个。单是近年出版的丛书,每册在五百页以上每部在十册以上的,总有好几种。一千页以上的大著,也有百余卷。‘中国’这个题目,日本人也不晓得放在解剖台上解

剖了几千百次，装在试验管里化验了几千百次。我们中国人却只是一味地排斥反对，再不肯做研究功夫，几乎连日本字都不愿意看，日本话都不愿听，日本人都不愿意见，这真叫做‘思想上闭关自守’，‘智识上的义和团’了。……大家都不愿意研究日本文日本话。问他们为什么？他们答应我的大约有两种话。一种说日本文日本话没有用处，不比英国话，……有用的。一种是说日本的本身没有什么研究价值，他除了由中国、印度、欧洲输入的文明而外，一点什么都没有，所以值不得研究。这两种思想，我以为前者是受了‘实利主义’的害，后者是受了‘自大思想’的害。……我劝中国人从今以后要切切实实地下一个研究日本的功夫。他们的性格怎么样？他们的思想怎么样？他们的风俗习惯怎么样？他们国家和社会基础在哪里？他们生活根据在哪里？都要切实做过研究的工夫。要晓得他过去如何，方才晓得他的现在是从哪里来的。晓得他现在的真象，方才能够推测他将来的趋向是怎样的。拿句旧话来说，‘知己知彼，百战不胜’。无论是怎样反对他攻击他，总而言之，非晓得他不可。何况在学术上、思想上、种族上，日本这个民族，在远东地方除了中国而外，要算是一个顶大的民族。他的历史关系着中国、印度、波斯、马来，以及朝鲜、满洲、蒙古。近三百多年来，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更是重要。我们单就学问本身说，也有从各种方面作专门研究的价值和必要，决不可淡然置之的。”（戴季陶 著《日本论》，海南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15—17页。）

我是继戴季陶先生讲述以上感铭之言后，过了半个多世纪的20世纪90年代末才到日本留学的。在留日期间，每当我漫步在东京神保町书店街，看到书店里琳琅满目的有关日本学者研究中国问题的著作的时候，每当我听到、看到毫无理由地排斥日本，认为“日本没有什么研究价值”的言论的时候，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起半个多世纪以前戴季陶先生的上面一段感铭之言。的确，时代变了，中国也变了，日本也变了。但是，国人对待日本的态度似乎依

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如果有人问,近代以来无论是在积极方面还是在消极方面,哪两个国家对中国历史和社会发展的影响最大。那么,大家都会不约而同地脱口说出两个国家——日本和俄国。仅就这一点,我们也应当重视有关日本问题的研究。

直到目前,到中国旅游的日本人人数依然远远超过到日本旅游的中国人人数,中国的科技,中国的日本问题研究虽然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但依然从整体上落后于日本的科技,日本的中国问题研究水准。因而,研究日本,了解日本,提高我国的日本问题研究水平,提高我国的东亚问题研究水平,对我们来说依然显得十分重要。在这全球化时代,如何提高我们研究日本问题、研究朝鲜半岛问题、研究东亚问题的水平?除了不为社会上的浮躁情绪所动,静下心来对相关问题继续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和研究之外,还应以新的研究方法和新的研究视野研究新老问题。特别是有必要以区域视野、全球视野,站在东亚中的中国、东亚中的日本、东亚中的朝鲜半岛以及世界中的东亚、世界中的中国、世界中的日本、世界中的朝鲜半岛的角度去研究相关问题。

本书是作者从国内外发表的有关日本问题的论文中汇集有关中日、日韩关系史方面的论文而成的论文集。如果从大学本科时接触日本问题开始算起的话,笔者接触日本问题的时间也有二十余年时间了。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本书也是笔者这二十余年来学习和研究日本问题的一次阶段性总结。

本书共收录论文 20 篇,这些论文最早的发表于 1991 年,最晚的发表于 2005 年。由于论文发表的时间跨度比较大,因此,论文的格式、风格、规范等也不尽一致,所以收入本论文集时作了必要的调整和统一。另外,增加由于篇幅所限,在正式发表时删掉的部分内容的同时也删除了部分论文中相互重复的内容,并对已发表的论文中存在印刷错误及错字、别字也进行了认真校订。

本论文集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即为中日关系部分。该部分从时间跨度上囊括了笔者对 1911 年辛亥革命到 1972 年中

日邦交正常化为止的中日关系中存在的重大问题的探讨及一些著作的书评。第二部分：即为日韩关系部分。该部分囊括了1945年8月朝鲜半岛摆脱日本殖民统治恢复独立到1965年6月日韩邦交正常化为止的，在日韩、日朝关系中的一些重要问题的探讨。如果本书的出版能为我国的日本问题研究、朝鲜半岛问题研究以及东亚问题研究尽一些绵薄之力，笔者将幸甚。由于作者水平所限，书中难免有错误和疏漏之处，敬请广大读者和国内外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在本书稿的整理和校对过程中，我爱人李金波和我的研究生张迎宏同学和沙靖宇同学也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对她们的无私帮助和辛勤劳动表示衷心的感谢。

另外，本书的出版还得到了黑龙江大学的出版资助和吉林文史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如果没有上述出版资助和支持，本书也很难问世。在此，对申请本书出版资助过程中给予各方面关照和帮助的黑龙江大学的各位领导、同事以及大力支持本书出版的吉林文史出版社的赵世德编审也表示衷心的感谢。

安 成 日

2005年3月15日于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寓所

目 录

序 言	1
-----------	---

第一部分 中日关系研究

略论日本帝国主义在我国东北的“经济开发”	3
试论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对日“和谈”问题	13
周恩来总理与当代中日关系的发展	24
石桥湛山与当代中日关系	37
试论佐藤荣作执政初期的中日关系	46
试论 90 年代日本政局的变化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64
孙中山与日本关系新解	
——读俞辛焯先生著《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	77
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辛亥革命时期中日关系的学术专著	
——读俞辛焯先生著《辛亥革命时期中日外交史研究》	85

第二部分 日韩关系研究

略论二战后在朝鲜南方日本人的遣返与日本	
及日本人财产的处理	101
论二战后在朝鲜北方日本人的遣返及其财产处理问题	121
略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的在日朝鲜人问题	138
略论二战后初期日本与南朝鲜之间的船舶归属问题	154
美国对日占领政策与日韩关系	173
旧金山对日媾和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韩关系	189
试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首次“日韩预备会谈”	206
试论第一次日韩会谈与日本对韩“逆财产请求权要求”	224

试析 20 世纪 50 年代中后期日韩关系出现松动

和变化的原因	246
试论岸信介内阁时期的第四次日韩会谈	262
池田内阁与张勉内阁的第五次日韩会谈	291
第七次日韩会谈与日韩条约的签订	326

第一部分

中日关系研究

略论日本帝国主义 在我国东北的“经济开发”

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东北的所谓“经济开发”，始于1905年日俄战争之后，结束于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投降，前后历时40载，留下了一大批殖民遗产。怎样认识这个殖民遗产？对此，历来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日本某些学者和个别有用心的人认为：是日本开发了东北，说什么日俄战争以后日本从俄国手中接收的东北是“人烟稀少的朔北旷野上的广袤平原”，是日本开发40年以后才变成了“包含有近代都市、在东亚也屈指可数的拥有近代产业的地方”，日本“率先引进，连日本也未曾有过的先进的诸制度和设施，给这个落后的地区一跃带来了近代文化”。并认为“不管其动机如何，日本人的技术和努力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1]。言外之意十分明显，就是说日本对中国东北的殖民侵略“有功”。无独有偶，前些年在我国亦出现了类似的观点。说什么“香港殖民化一百年有了今天的繁荣，如果大陆也殖民化一百年如何？”其意义也甚明，即殖民化“有功”。那么，我们到底如何认识殖民化？如何认识日本对东北的“经济开发”？我想在下面略述我的一孔之见。

一、日本对我国东北的“经济开发”是以武装侵略中国，粗暴地践踏中国的主权为前提的

1900年，中国义和团运动兴起，帝国主义列强纷纷出兵镇压义和团运动。沙俄也趁机出兵中国东北镇压义和团运动，但运动被镇压以后沙俄迟迟不肯撤兵东北，企图趁机占领东北。这就严重影响了日本的“利益”——即侵略东北的野心。这样日本便以沙俄拒不撤兵为借口，于1904年在我国东北发动了践踏中国主

权、蹂躏我国东北疆土和人民的帝国主义战争——日俄战争。日俄战争期间,日本口口声声说“毫无占领大清国领土之意”^[2],但战争一结束就无视中国的主权,日俄私下拿中国的领土和财产作交易。日本从沙俄手中取得了南满铁路(长春以南到辽东半岛)及附属地的一切权力、特权及财产,夺取了旅顺、大连港及附近领土的租借权。为了使日俄这一非法交易“合法化”,日本又利用种种卑劣手段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并通过这个条约,不仅使日俄非法交易“合法化”,而且使之有了进一步的扩大。而后日本为了巩固其“战果”和进一步侵略东北,1906年8月,设立关东都督府,经营旅顺、大连及其周围的租借地。同年11月26日,又设立“南满铁路株式会社”(简称“满铁”)经营南满铁路及附属地,开始了以铁路为中心包括港口、交通、工矿、文教、医疗、商业、城建等各方面的所谓“开发”。日本对东北的所谓“经济开发”,就是通过这种践踏中国领土和主权的日俄帝国主义战争迈出第一步的。

20世纪30年代初,世界帝国主义各国面临严重的经济政治危机。日本帝国主义也不例外。为了转嫁经济危机,摆脱国内政治经济困境,为了实现侵占整个东北的野心,1931年9月18日,日本制造了“柳条湖事件”,大举侵略东北,几个月内侵占了整个东北。为了掩盖侵略罪行,1931年3月1日,在日本关东军的一手导演下,清朝废帝溥仪演出了一场复辟丑剧,建立了日本一手控制的伪“满洲国”。伪满成立以后,日本一方面加紧对东北的殖民统治,另一方面也加紧了所谓的对东北的“经济开发”。从“9·18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日本制定了一系列的所谓“开发”计划。但这些美其名曰“开发”的“计划”和“方案”,其目的都并非是为了真正建设东北。且看1932年12月8日,日本关东军制定的《开发满蒙方案》中的日本侵略者的自白吧!在该方案中,日本明确指出:“开发”东北的目的就是“(一)要确保平战两时军需资源;(二)满蒙开发要为日本经济发展作贡献;……(四)开发

满蒙政策要实行日满一体的经济计划……”^[3]。很显然,日本“开发”东北的目的就是将东北变成日本的经济附庸,掠夺东北的资源和财富,为日本的侵略扩张战争服务。

二、日本对东北的“经济开发”是直接为日本的军事侵略扩张服务的

日本对中国东北所谓“开发”中“成绩”最为“卓著”而且也是最先开始“开发”东北的,首推“满铁”。如果想了解日本对东北的“经济开发”到底是什么货色,剖析“满铁”就可见一斑。因为,“满铁”不仅是“日本对满洲在外交、经济、国防等各个方面发展的中心机能”,而且又是“日本东亚政策的主干”和“确保日本国家生命线的前卫”^[4]。“满铁”是“掌握着日本国防上,产业上的生命的重要工业”,“满铁”的经营方针所体现的即为“日本国策的反应”^[5]。在东北殖民统治 40 年中,日本统治者几度更替,但作为“生命线”的满洲以及作为其中心的“经营满铁的根本方针,丝毫没有变化”^[6]。

那么,“满铁”是怎样成立,又怎样对东北进行“开发”的呢? 1905 年,在日俄战争中,日本打败沙俄取得了包括南满铁路在内的沙俄在我东北的侵略权益。战后,为继续推进“大陆政策”,日本不久便成立了“满铁”。“满铁”自筹备开始就表现出了极大的不寻常性。这也充分反映出其强烈的军事、政治目的性。1906 年 5 月 22 日,《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墨迹尚未干透,日本内阁就迫不及待地阁议决定成立“株式会社”,经营南满铁路。接着同年 6 月 7 日,便以天皇第 142 号敕令的形式正式公布了“关于设立南满铁路株式会社案”。据此,同年 7 月 13 日,“满铁”设立委员会,由日本陆军参谋总长儿玉源太郎任委员(儿玉死后由陆相寺内正毅接任),于同年 11 月 26 日,在东京基督教会馆举行成立大会宣告了“满铁”的成立。一个“会社”的成立竟然牵动了上至天皇下至内阁、军部,而且由军部直

接出面组织会社,这在日本公司发展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足见其在日本对外侵略扩张方面的独特地位。

“满铁”的这种特殊地位,在“满铁”第一任总裁后藤新平于“满铁”成立伊始,即提出的经营东北的总方略中也可可见一斑。当时后藤新平提出,为使日本在东北处于“以主制客,以逸待劳的地位”,主张“第一,经营铁路;第二,开发煤矿;第三,移民;第四,发展畜牧、农业”。这样后藤认为“战机对我有利,则可进而做侵略敌国之准备;如对我不利,则俨然不动,持之以和,等待时机”^[7]。在这里,经营铁路被放在日本在东北进行侵略扩张的首位。根据这一经营方略,“满铁”初期的经营活动多着眼于军事侵略目的。铁路建设自不待言,“满铁”开办的交通事业、港口、文教、医疗、城建、工矿企业等都着眼于军事目的。正如其参与者所言,“抚顺及烟台煤矿的开发不但是为了满铁赢利上的打算,即在协助满铁贯彻国家使命方面也有莫大的功绩”^[8]。

“满铁”不仅以军事侵略为先导对东北进行所谓“开发”,为日本“进行侵略敌国做准备”,而且还作为准军事机构直接参与了日本的军事侵略活动。1931年“9·18事变”中,“满铁”全体总动员,“勇敢诚实的满铁社员,开动军用列车,兴筑铁路桥梁,架设电信、电话,有的身处第一线,在枪林弹雨中协助日军行动,以后继续协助日军讨伐匪类”,真可谓“功绩不可磨灭”^[9]。事实上,在“9·18事变”中,“满铁”成了日军的重要运输线,大连关东州及“满铁”附属地成了日军侵吞东北的大本营和兵站,“满铁”所属的各地医院成了日军的野战医院,“满铁”经营的工矿企业成了日军的军需工厂,“满铁”开办的学校培养出来的“人才”,成了日军侵占东北各地的马前卒。

“9·18事变”以后,日本完全吞并了东北。日本一方面加强殖民统治,另一方面加紧“开发”东北,炮制了诸多的“开发”“计划”“方案”等。但其“开发”为日本的军事侵略扩张服务的

宗旨仍然没有变化,关东军一手制定的《开发满蒙方案》自不待言,以后的《满洲产业开发五年计划纲要》、《满洲开拓政策基本纲要》、“振兴北边计划”等也有极强的军事目的性。如《满洲产业开发五年计划》以 1941 年为目标,建立对苏作战准备所需物资供应基础,其核心是掠夺东北的军需资源。正所谓“置重点于就地开发有事之际所必需的资源,并尽可能谋求国内自给自足和供给日本的不足资源”^[10]。而《满洲开拓政策基本纲要》和“振兴北边计划”除了掠夺东北土地资源的目的之外,主要是为了提高关东军的纵深防御能力和总体作战能力。由此可见,日本对东北的所谓“开发”都不过是为日本的侵略扩张服务的。

三、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进行“经济开发” 的目的就是为了掠夺东北的资源和财富

日本是一个国土狭小、资源贫乏的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明治维新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狭小的国内市场,贫乏的资源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为了开拓国外市场,掠夺资本主义发展所需要的原料和市场,为了实现日本的侵略梦想,日本不惜“赌国运”,终于在 1905 年在东北站稳脚跟,开始了对东北的“开发”。

日本对东北的“开发”,自始至终都是伴随着掠夺而进行的。日俄战争后,为了掠夺东北的资源和财富,日本首先集中控制和“开发”了东北的铁路事业。从 1905 年到 1931 年间,日本利用其国策公司“满铁”控制了东北近 20 条铁路线。日本利用这些铁路线,对东北资源进行了大肆掠夺,1907 年到 1927 年满铁货运量增加了 13.5 倍,利润增加了 18 倍。1931 年“9·18 事变”后,日本通过利用满铁和伪满签订《关于满洲国铁路、港湾、水路、空路新线的修建管理协约》及众多铁路、水路、航空等的“委托经营契约”,全面霸占了东北的铁路及水陆空交通的管理权、经营权和修建权。建设铁路、公路,修建港口、码头、机场等似乎是一种简单

的、文明的事业,但“事实上,几乎资本主义干线已经用千丝万缕的密网把这种事业与整个生产资料私有制联系在一起了,已经把这种事业变成压迫附属国(殖民地、半殖民地)里占世界人口半数以上的十亿民众和‘文明’国里资本的雇佣奴隶的工具”^[1]。

日本在东北攫取路权,开发铁路、公路、水路、空路就是为了便于掠夺东北的资源,奴役东北人民。此外,日本还在东北占领大批矿产,开办众多工厂、企业和公司,对东北的资源和财富进行了掠夺。

首先,日本在东北强占大批矿产资源对其进行了掠夺。日俄战争后日本即对侵占的抚顺、烟台、本溪湖煤矿及南满地区的许多中小煤矿进行了掠夺。接着 1915 年,由迫使中国政府签订《中日南满九矿山换文》,侵占了鞍山铁矿、本溪湖田师沟——牛心台煤矿、吉林缸窑煤矿、和龙煤矿、桦甸夹皮沟金矿等九矿。这些矿山生产的煤铁等资源,除一部分供东北消费外,绝大部分运往日本。“9·18 事变”后,日本占领全东北,加紧了对东北矿产的掠夺。1932 年 9 月,日本同伪满签订《关于国防上需要的矿业协定》,夺取东北及内蒙的 38 处重要地方矿产,并设立包括满铁在内的“满业”、“满洲煤矿”、“昭和制钢所”、“本溪湖煤铁”、“满洲矿山”、“东边道开发”、“吉林人造石油”、“密山煤矿”等大批特殊公司,对东北矿产资源进行了大肆掠夺。

其次,设厂、办公司掠夺东北的农牧水产品。日俄战争后,日本即开始在大连关东州设厂,到 1915 年关东州内各种工厂就已达 247 家,到 1923 年,日本在东北的工厂已增加到 637 家。这些工厂主要经营农牧水产品加工工业和轻工业,利用日本的技术优势排挤东北民族资本,利用当地廉价劳动力掠夺和聚敛了大量财富。此外,日本还设立“南满制糖”、“满蒙毛织”、“满蒙纤维”等公司,控制和掠夺了东北的糖、羊毛、棉麻等农林产品。

再次,日本还大力掠夺东北的森林资源。从日俄战争后,通过《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夺取鸭绿江右岸的中国森林采伐

权开始到 1924 年,日本通过各种手段攫取东北森林资源,在东北成立了日本实际控制的大小林业和木材公司 20 余个,对东北的森林资源进行掠夺。这些公司生产的木制品除了部分运往中国内地和用于本地需要外,大批运往日本或出口。

第四,大肆掠夺了东北的土地资源。通过日俄战争,日本夺取了旅顺、大连租借地和满铁附属地。1915 年,日本又通过迫使中国政府签订《关于南满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攫取了这一地区的土地“商租权”、“农业合办权”,为日后掠夺土地打开了方便之门。在土地掠夺方面,“满铁”、“东拓”、“东亚劝业”等都可谓是大户。1907 年满铁成立时,附属地仅 149.7 平方公里,但到 1931 年经其长期蚕食、兼并、强占、非法收买,附属地增加到 482.9 平方公里。此外,满铁还占有林地、农业设施、农场等。“东拓”自 1917 年秋进入东北以来截止到 1922 年底,在东北掠夺了 133.82 万亩土地。“东北劝业”自 1921 年成立以来,在东北掠夺了 1307.2 平方公里。“9·18 事变”后,日本又开始组织“开拓团”大量移民东北,占领大批东北的耕地和可耕荒地。

第五,除了上述资源和土地外,以黄豆为主的东北特产也是日本掠夺的主要对象。20 世纪初,东北的大豆产量约 3000 余万担,占当时世界产量的 50%。日本国内需求量为 700 万担,日本自给 400 万担,其余 300 万担全部从东北输入。日本每年从国外进口 1.5 亿日元的农肥,其绝大部分是从东北进口的豆饼。

第六,在金融方面,日本也加紧对东北的渗透和控制,直接掠夺东北人民的财富。日本正金银行、朝鲜银行、中央银行等在东北积极开设本、支店。1906 年日本在东北的银行本店仅 1 家,支店 7 家,但到 1914 年本店增加到 12 家,支店增加到 22 家,到 1922 年进一步发展到本店 55 家,支店 55 家。此外,还有所谓中日合办银行 10 家。其网络遍布东北大中城市。日本在东北的银行实缴资本已超过了中国官银票号、银行和钱庄。日本利用这些银行发行钞票、金银券及各种有价证券,垄断汇兑,操纵汇率,直